现代文明中的中国文化

目　录

第四章现代化中的文化选择与传承 …… 猿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精神的缺失与生成 …… 源
员、中国现代化内在文化精神的缺失 …… 缘
圆、中国现代化主导性文化精神的生成途径 …… 员远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的转型与文化价值的重构 …… 圆猿
员、文化转型的价值与潜在背景取向 …… 圆远
圆、文化模式建构的实质：价值重构的生存模式 …… 猿愿
猿、文化模式建构的尺度：价值重建的历史方位的确定 …… 源源
源、文化模式建构的目标：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的文化启蒙 …… 缘园
缘、队的现代化——中国当代文化的培育 …… 缘远
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分化与整合 …… 苑缘
员、大众文化的核裂与市民文化的萌生 …… 苑苑
圆、精英文化的分化与冲突 …… 愿园
猿、分化与整合：当代人文精神的重建 …… 愿源
源、中国当代文化的历史积淀与发展取向 …… 愿愿

第五章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与借鉴 …… 怨元
一、借鉴与吸收当代西方文化中的精华 …… 怨愿
员暂西方现代化文化精神的内在机制 …… 员园
圆暂政治的堡垒：西方社会经济文化 …… 员缘
猿暂经济的推助器：西方政治文化 …… 员缘
源暂时代的特征：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 …… 员园
二、甄除与防范西方文化中的负面因子 … 员猿
员暂科技理念能否挽救江河日下的资本主义 …… 员缘
圆暂现代西方社会文化的矛盾与危机 …… 员远
猿暂批判与限制西方文化的范围与方式 …… 员员
三、东西文化交汇及全球文化的认同 …… 员源
员暂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 …… 员员
圆暂21世纪是人类文化走向认同的世界…… 员远
第六章：中华文化在未来全球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 …… 员猿
一、中华文化复兴的潜质 …… 员猿
员暂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 …… 员远
圆援重直觉的整体思维的现代科学内质 …… 员怨
猿援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光辉 …… 员缘
源暂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 …… 员远
二、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磁力与张力 ……
…… 员源
员暂儒道的现代生态智慧与理念 …… 员怨
圆暂道家文化与现代科技思维 …… 员怨
猿暂儒道人生理想论的现代价值 …… 圆缘

源：传统易学与现代管理科学 …… 圆猿圆
三、中华文化——未来普世文化的精血 … 圆源员
员：和合和人文精神——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 …… 圆愿圆
圆：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意义 …… 猿员员

第四章　现代化中的文化选择与传承

历史总是流动的、具体的。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历史的相异性和同一性。如果看不到古与今的差异和区别，那在现代化进程中，就根本谈不上对文化的选择与传承。文化的积淀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千万不可认为它们是固有的模式，那就曲解了历史。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认为历史没有同一性，那么人们研究中华文化就失去了任何意义。那也谈不上对从古到今的中华文化的选择与传承。思想文化的发展就是相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正如睿智的哲人所言，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

中国文化是一个演进着的生命之流。从其源头中的优秀文化基因到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再到现代新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扬弃自身的历史过程，在这里，“传统”不单是‘过去时’，而且还是‘现在时’和‘未来时’。“传统”成为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一整体时间中的一个“过程存在”。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一种生存方式，人类通过劳动创造了文化，再通过文化求得自己在自然界中的生存和发展。这种适应从传统到现代，表现都是积极的、创造的、连续的。它反映的是历史的进程，人类的进步，文化的承继，文明的发展。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选择与传承，也就是适应与创新的过程。研究中华文化特别是现代化文化就需要有历史辨证的观点。今天与未来的文化传承不只是以往思想文化的翻版。没有科学的

继承，便谈不上科学的发展。同样如果没有创新，所谓继承便失去了意义和基础。

面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中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质是人文精神在现代的重新体现。现代人文精神的产生，是其按自身规律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位去演变和生成，去转型和重建，去裂变和整合。现代化作为传统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文化重建的创造过程，在现代科技的激荡下，“传统”通过自身的选择、调整、变更，而实现其创造性的转换。现代化既是人类历史进化的趋势，也是民族文化进化的产物，它在转化出普遍的现代功能的同时，也存留着传统体制的特质。因而，现代化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精神的缺失与生成

文化精神的延续积淀即形成传统。文化传统就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实践活动中积累而成、历代相传、相对稳定的文化因素，它是决定文化及其类型形成、延续、发展或停滞的相对稳定的内在要素，也可以说是社会、民族或区域文化的“遗传因子”。

面对步入新世纪的中国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建构而正在经历着深刻的价值冲突与文化裂变：多元的利益和多元的需求正在驱动着大众层面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对独立地、自律地、多元地流变；现代的多重文化精神正在促使精英层面的人文知识分子把探究的目光聚焦于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冲突、裂变与转型或重建问题。这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正在走向深化，从技术操作和经济运作层面进到价值重建和文化

转型的局面。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型过程,面临着西方现代化所远不具有的特殊困难。文化的积淀与其保守的惰性成正比,而文化的成熟专化则与其适应环境的能力成反比。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类型,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具有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具有的难度。然而,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困境之一,正与这一文化精神的生成状况相关。从目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大众层面的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精英层面的文化精神的裂变中,以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为本质的自由自觉的、理性的、契约的现代化文化精神并没有作为无可争议的首选文化精神而勃勃生成,由此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的缺失。这是一个严重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中国现代化主导性文化精神的缺失问题,并揭示现代化文化精神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的生成途径。

一、中国现代化内在文化精神的缺失

现代化是当代世界最普遍的时代主题,它构成了一条使人类大多数民族步入其间的世界历史变革之链。这一十七、十八世纪发轫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渐次扩及全世界的社会变迁过程,范围及于经济、政治、观念等社会生活的各层面,标志着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世界性社会变形。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引发的。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中国近代的落后性上。反观中国目前正在展开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发现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虽然现代化作为一种理想的价值目标和实践奋斗目彪在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是,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

相互结合为内涵的工业文明或现代化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始终没有作为无可争议的价值得以真正的确立。不仅如此，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文化启蒙而初步生成的人之主体性在90年代市场经济建构、现代化处于十分关键的时刻非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反而呈现出某种走向消解的征兆。

从总体上看，造成中国现代化内在文化精神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定位，这是一个分析中国现实问题万万不可忽视的因素。基于传统宗法农业经济的中国文化本身是个自足的文化系统，它以其文化的高度专化和对环境的高度适应性，而成就为举世无双的辉煌的农业文明。然而一种文化内在的潜能一旦发挥到极限状态，并达到对环境的完满适应，那么，此文化系统就会趋于稳定而影响其对新的环境的适应能力。此即“文化守旧性”。按照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优势”法则，一种高度专化的文化往往长失了向更高形态文化进化的优势①。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么无情，古代中国文明的伟大之处也恰恰成了其向现代转型的障碍。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完成的现代化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业已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这种历史错位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特殊的历史定位，它使得原来应当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的嬗变和演进，由于中

① 参阅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1988年版第四章

国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它把加速发展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和消除现代化负面效应的历史任务同时置于刚刚踏上现代化征程的中华民族肩上，并使中国人备受对现代化前景的渴望和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恐惧两种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文化心态的困扰。

综上所述，导致中国现代化内在文化精神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现代化文化精神的自我裂变：人本精神与技术理性的冲突

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里，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一种相对狭隘的文化心态和思想观念，正不可避免地遭到有力的冲击，因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引入注目的深刻变化。各民族置身于这种全球范围内科技高速发展不可抗拒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中，都从各自大规模的现代化的生产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先进的科学技术令人惊叹的力量。它不断创造出无数叫人难以想象的奇迹，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这是我们时常称道的现代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的积极的一方面，但各民族在此同时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之后所造成的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如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的匮乏，生态失衡，现代科技化的生产系统使各部门所需要的工作人员的数量大量减少，这就造成了就业的困难，其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倘若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对社会结构、生活秩序的冲击和破坏在人类心灵上所引起的一系列反应都是各个国家、尤其是科技发达的国家里的人文科学家们共同研究的中心课题。所要达到的共同的目的，就是

要对现代科技社会中的人的生存状况、人的命运、人的生存价值以及人性扭曲的具体情况作出科学的描述和阐释，以引起世人的重视和思考，从而能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缓和或逐步解决这种种与人性相悖的现象。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定位，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与西方不同，出现了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之间的张力，二者尚未在中国文化精神中取得主导地位就已经发生冲突。具体说来，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关于现代化的文化心态：当一种价值取向强调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以及它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的时候，另一种价值取向则从西方的历史经验中看到科学技术及其技术理性自律发展所带来的普遍物化和人之异化等负面作用，从而对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持一种人本主义的批判和拒斥态度；当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强调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对人的文化启蒙以及人之主体性的生成对于市场经济建构和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的时候，另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则为个性的过分张扬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所带来的价值混乱和道德滑坡等现象忧心忡忡。应当承认，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之间的张力过早地展开这一事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社会减少或消除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过分发达所带来的技术世界的普遍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分裂，但也的确存在着干扰和延缓现代化进程的危险。中国现代化会由于缺少一种统一的文化精神而迟滞，呈现为一个乏力的进程。

（2）儒学新论潜在的主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中国文化的复兴，题中应有之义就应当包含儒家文化的复兴。[illegible]世纪以来，几代

新儒家的学人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然而却很难说他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尚未找到新儒学的社会载体。每一种文化思潮在社会上发达、流行，必有坚实的载体。如果说，早期的、严格意义上的新儒家，如牟宗三等人，无论如何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还毕竟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或现代工业文明的总体适应问题，期待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那么，目前“国学热”中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关注点则不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而是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医治工业文明本身的弊端或现代化的负面效果，如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生态环境的破坏、心理平衡的打破等问题。进而，一些人由此而得出中国传统文化将在 21 世纪复兴的结论。尤其当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更是引起一些人的共鸣，他们愤愤地批判和拒斥西方“帝国霸权主义”打着现代化旗号对中国文化所进行的“后殖民文化统治”，从而要求坚持中国文化自身的话语。

对于现代新儒学兴起的思想根源，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有较为精到的评述：“现代新儒家们感受到西洋文化思想的震荡，而思调整并发扬中国哲学以应新时代的需要，他们的心理分析起来，大约有几种不同：有的人对于中国的文化有了宗教的信仰而认为西方文化有了危机，想发扬中国文化以拯救西方人的苦恼；有的人看见西洋思想澎湃于中国，中国文化有了被推翻被抛弃的危险。抱孤臣孽子保持祖宗产业的苦心，亟思发扬中国哲学，以免被新潮流所冲洗而荡然无存；有的人表面上攻击西洋思想，而不知不觉中却反受西洋思想的影响；也有人表现上虚怀接受西洋思想，然而因不明西洋思想

的根底，他所接受的乃非真正的西洋思想，而仍然回复到旧的窠臼。”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新儒学是在西学浪潮汹涌而来且利弊得失也较清晰地展示出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地以本土文化为依据做出的回应，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百余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保守主义心态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它不是一种出于使原有社会体制和文明形态自我完善、取得合理性的“主动的现代化”，而是出于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的历史紧迫性的“被迫的现代化”。由此而形成了具有复杂情结的中国现代化心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期待”不是对获得新东西的渴望，而是对失去旧有物的恐惧，于是，保种、保教、保国、保民成了现代化的核心。传统文化作为传统农业文明形态的血脉和人们习以为常的生存方式，凝聚着民族的认同感和标志，它自然被置于“保”字的中心，相应地，文化保守主义成为弥漫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主导性社会心态。洋务运动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构成尔后百年现代化的心理定势，而以梁漱溟的中国文化“复兴论”为激进或极端代表的新儒学思潮亦开始兴起。进入 [illegible] 世纪 [illegible] 年代，新儒学思潮开始重新在中国大陆复兴，先是牟宗三、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方东美、刘述先、余英时、徐复观、杜维明等一批新儒学代表人物的著作被出版、研究和评介，接着是一些颇有影响的学者开始从自己原来明确倡导的以科学、民主和人之主体性为宗旨的文化启蒙立场撤退，回到以“天人合一”观念和伦理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于是，一种拒斥现代化、批判现代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正在中国学术界泛起。

应当承认,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很早就通过直观的方式比较深刻地体悟到人和自然相统一即‘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对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条件下面临着人与自然相分裂、人与人相异化之历史困境的人类确实可以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但是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念的强调只是对原始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天人合一’关系的模糊体悟,它根本无法与后工业文明时期人们基于人和自然分化之后形成的人须与自然相统一确切知识的文化精神同日而语;同时,这种传统文化精神是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的最集中的体现,它同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和建构的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所要求的自由自觉的行为方式和文化模式格格不入。尤其应当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非是人与自然的过分的分化与分裂,而是人与自然相对不分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发达状态。困此,当新儒学试图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直接引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当人们试图直接以儒家伦理来重构中国社会以避免现代化的负面效果,或者,当人们把后工业文化精神与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直接联姻或对接时,其结果只会导致中国现代化‘以过去为定向’的时代错误,从而消解现代化文明精神,断送现代化的前程。

(猿)后现代文化思潮对现代文化精神的消解

自 圆缘世纪中叶以来,‘后工业社会’的提法在西方社会逐渐流行开来。与这种关于社会生活的概念表述相关联,在思想文化层面,则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文化’等表述用语。准确地界定上述概念用语的内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因是 圆缘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复杂流变以及西方社会的历史转

型,导致人们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观念体认上的差异。然而透过这种表述,我们还是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到西方 □□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历史脉动——在工业化走向成熟之后,人们面临着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历史转型。从这个角度上说,“ 后现代主义 ”和“ 后现代文化 ”作为这一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重要思潮,客观上构成了 □□世纪人类文化演化的重要阶段。可以这样认为,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文化运行的基本形式。□□世纪 □□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西方社会进入了后工业阶段,而与之相应,现代西方文化也经历了一次次新的裂变,随之全面推进到后现代时期。后现代主义文化在西方的迅速崛起反映出西方文化流向的新变化。□□世纪 □□年代初,在新儒学重新在大陆复兴的同时,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开始通过文学与哲学领域而切入中国。这两种文化思潮虽然在文明时代上相距遥远,但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则有一个共同点,即对现代性或现代文化精神的否定态度。如前所述,从 □□世纪下半叶起,尤其在 □□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的两大支柱精神即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开始出现张力和冲突,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过度发达并没有达到人的本质力量增强和人的解放的宗旨,而是导致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破坏和人际交往关系的异化,导致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社会力量对人的统治。针对人类的这一文化历史困境,于 □□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以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同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思潮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同样,以深刻批判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为己任。后现代主义认为,人之主体性及启蒙理性的发展是造成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根源,因此,德里达对逻辑中心主义的解

构，福柯对现代人的消解，利奥塔德对多元叙事或宏伟叙事的否定，其宗旨都是对人之主体性和现代性的消解。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是出于对西方发达工业文明弊端的敏感的认识和对中国现代化中已开始出现的某些文化失范现象的忧虑，而接纳后现代文化精神，企盼中国能超越工业文明阶段，直接步入后现代社会。

后现代文化在中国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来因素的影响固然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为后现代文化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尤其是从 [illegible]世纪 [illegible]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进而导致由前工业化、前现代化向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转型期的文化重新调整、重组为这种后现代文化的进入提供了条件。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层变革，这是后现代文化兴起的最根本原因。这就是说，无论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多么有序规范，后现代文化都可能与之相继而生。这也是后现代文化风靡当今欧美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共同原因，它反映了中国后现代文化具有的与各国后现代文化相仿的普遍性。这具体表现在：

首先，我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因改革开放而发生了变化。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行的是当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混合经济模式，除了国有的和集体的经济成分之外，还有个体、私营以及外国资本的投入，随着这些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中国由非法变为合法，由弱小变为强大，代表这些经济成分利益的意识形态也逐步形成并合法化。政府允许那些后现代的美术、音乐、影视和文学等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的合法流通。

多元的经济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非主流文化，开始与作为‘主旋律’的主流文化并存。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原有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都是由国家安排好了的，社会阶层泾渭分明，难以变迁，而现在则不同了，阶层之间的变动、融合与互渗的频率加剧。过去一些高雅的阶层、集团和职业变得日趋世俗化和平民化，而一向被忽视的阶层如个体户、私营企业等则日益受到理解和尊重。总之，社会阶层的升降起伏，使人们的等级观念和雅俗观念发生了变化，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淡化权威、雅俗合流、亦雅亦俗的后现代文化的崛起和蔓延。

其次，商品生产规律和市场法则对文化生产的渗透和冲击。随着市场经济全方位的发展，社会文化秩序也受到了冲击和影响。使商品规律不仅支配着我们的经济生活，而且还日益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是市场法则进入了文化的生产过程，使文化的生产目的、传播手段和文化自身的存在方式、存在价值都全面地商品化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高度商品化的后现代文化的出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不仅如此，市场经济还激活了广大民众多年来被压抑的消费欲望和享乐倾向，新的消费意识和享乐风气不仅表现在物质消费上，也表现在文化消费上。文化的制作者和消费者都不满足于十年磨一剑的所谓风格化的艺术作品，他们更要求花样迅速翻新，并可以大批量复制的后现代文化产品，以满足大众的这种日益膨胀的文化消费欲望。

此外，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的切入还与中国社会大众文化所呈现出的某种‘准后现代性’特征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

的浪潮冲击下，大众文化开始摆脱了昔日的意识形态特征取得了自律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尚未形成以个体化和人之主体性为核心的自觉的市民文化或公民文化，所以，大众文化主要以生活世界的衣食往行、饮食男女为主要内涵，在消费文化、通俗文化的引导下自律地、多元地流动，呈现出一种贴近生活原生态的平面文化特征。而以池莉、刘震云等为代表的“新写实”群体放弃以人之主体性为宗旨的文化启蒙立场，同日常生活世界认同，以“过日子”、“凑合着过”为生存的本真状态，这些又大大地加重了大众文化的平面化特征，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主体性和现代性的消解提供了条件。

第三，生存体验的“片断化”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illegible]世纪[illegible]年代前，人们的生活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大多数人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交往，很少与外界交流，因此那时人们的生活是自然素朴的、完整的。改革开放后，人们原初的生活经济逐渐消退，日新月异，五彩斑斓的万花筒式的生活图景成了人们生活的主导潮流，而以拼贴、瞬间感受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种体验的表达，与瞬间性艺术同时盛行的是视觉艺术（尤其是图像化艺术），电报电传、电影电视，使万里之遥变得近在咫尺，天下见闻顷刻尽览无遗，加上复制等生产技术和现代广告的狂轰乱炸，人们对图像的、类像的文化产生了空前的兴趣，即使是时间性的文化，也要尽量使之空间化和图像化。总之，当代文化放弃了时间上被永久接受的追求，渴望在空间上被广泛认同，这也是我国目前文化生产日益走向平面化、图像化或后现代文化的原因。同样，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人们生活节奏紧张、迅速、迫切要求在快节奏、高强度的劳动、工作之余放松一下自己。因